

在黑白和彩色的網點之後

--到紐澤西，訪琦君女士 廖玉蕙 2001.09.13.

在十字路口簡單問過路後，朋友王希亮居然在錯綜複雜的陌生地，一下子便找到了散文家琦君的住所。進到琦君的屋子，入眼的，是電視機中的台視新聞，陽台上，一座大大的衛星小耳朵。

老人家記錯了日子，以為是下個星期的採訪。為了另有約會，無法在訪談結束後和我們共進午餐，琦君女士懊惱不已，頻頻致歉。臨別，除緩步送到大門口外，還深情地踱到陽台上，倚著欄杆，像個小女孩一般，一再依依揮手，身影瘦瘦小小的。不經意間，我抬眼瞥見瘦弱身影上方的屋頂上，徘徊著淡淡的雲彩，驚訝美東的八月天竟然隱隱已有了秋意。

廖：您最近好像文章寫得稍稍少了一點？

琦：是根本就沒寫了！腦筋遲鈍了嘛！寫不出來了。還有一點是趁機可以多留點時間來拜讀朋友的文章。一看朋友文章，自己就更寫不出來。年齡也不對了，重複的話再寫也沒意思了。比方說，有個出版社要我寫回憶錄，但是，我一向的作品幾乎就都是回憶的，再寫重複不好。假設那些不寫，就沒東西，乾脆不寫了。

廖：最近身體好嗎？

琦：身體還可以，只是風濕，有時候會犯頭暈。今天身體狀況很好！要不然，有時候犯起來會天旋地轉。醫生也不知道原因，大概是生活有點緊張，現在好多了。

廖：我來紐約之前，有一個網站上的讀者聽說我要來看您，興奮得不得了。這個名叫 eLeven 的讀者曾為您製作了一個《琦君小棧》的網站。他還提了幾個疑問，希望我能幫他請教您。首先，他請問您的真實姓名是「潘希珍」或「潘希真」？以前教科書寫的是「真」，後來國立編譯館根據一篇您的文章改為

「珍」，說希珍乃「稀世珍琦」之意。這問題似乎也困擾不少國高中的國文老師。

琦：實際上，我最早的名字是珍珠寶貝的「珍」，因為，大學時候，我的老師說女孩子老是珠光寶氣的不好，所以幫我改為「真實」的「真」。聲音念起來還是一樣，是「希望真實」的意思。但是我的身分證和許多的證件，都還是用原來的「珍」，所以實際上還是珍珠的「珍」。

廖：您曾在書中提及：親生父親一直留在外地不回家，所以被親生母視為不祥。想請問你很多篇文章中的那位滯留外地、不肯回家，娶二姨太及三太太的是指親生父親，還是指你的大伯？

琦：我所謂的「父親」其實是指我的大伯，我寫的媽媽就是我的大伯母。我出生時，爸爸出外經商，一直沒回來，我媽媽認為我不祥，就把我丟在地上，是大伯母把我抱起來，從那時起，她就成為我的媽媽，把我養大。所以，我散文中的父親指的就是大伯。我的親生父母在我一歲時去世。

廖：這一陣子，您的小說〈橘子紅了〉被改編成電視劇在台灣的公視播出，引起很多的迴響。您對於文學作品改編成電視劇抱持怎樣的態度？

琦：我是很惶恐、也很興奮的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。我沒寫過長篇小說，一般頂多寫個一萬多字，這是我唯一寫四萬多字的小說。我不知道值不值得將它改編成電視劇，跟主編先生談過，也用電話跟徐立功先生談，他說：「我們選你的作品改編，自有我們的主張。」我說你們要改編是可以的，但是唯一的條件是不可以有色情摻雜在裡頭，他要我放心。後來，我請他把改編的電視劇寄一份來給我，因為我雖然不是很懂，不過，我很喜歡，也可以多學習。他們說寄來的規格可能不一樣，必須經過轉錄，所以，我正等著看。我想，原則是沒有問題的，他們也讓我放心。至少鼓勵我，我還會繼續再寫嘛！而且，劇本寫作的夏美華我很熟，她還要再找我的其他作品再來編。

廖：這戲將那種大家族的氣氛醞釀得不錯。不過，聽說衣服太華麗、太貴了，以致沒辦法做很多套。因此，觀眾反應演員常穿同一套衣服，有些奇怪。

琦：是啊！觀眾還是會有一些要求的，不過主編和工作人員也有種種的困難。光是橘園內的橘子聽說就買了好幾噸，我也很感動，李少紅還給我來過信，寄了幾張劇照給我。我說：「怎麼那麼豪華？我們家哪有那麼闊氣！」她說這是應觀眾的要求的，我們要弄得熱鬧一點。我妹妹還跟我說：「姊姊，我媽媽不是這樣。」我說：「這不是寫你媽媽，這是我編的故事。」故事總是半真半假的嘛！

廖：那麼就像你剛才說的，你的作品其實拼湊起來，就很像一本巨型的回憶錄。可以看出您對往事的記憶相當驚人！是記憶力特別好呢？還是曾做了輔助的功夫？譬如做筆記？

琦：我從來沒有作筆記的習慣。我筆頭很懶的，腦子倒是很清楚，什麼舊時代的事情我都記得清清楚楚的，比如說一個人怎麼樣，說話什麼形態，我都記得。可是要我把記的東西寫下來，我沒有這個習慣。我現在反倒是「不記近事記遠事」。比方說，我現在出去旅行，也不太記得風景，看風景還要記筆記？反正電視上也都有的，不過，這也是缺點。就像現在要寫回憶錄就很難，因為舊時代的片段我都已經寫過的了，現在的，又沒記下來，所以是很難的了。

廖：這實在是了不起，如果沒記筆記，居然能記得那麼多，那妳的記憶力果然是很驚人。平常寫日記嗎？

琦：也沒有。

廖：哇！糟了！上散文課的時候，我都跟學生說，琦君女士一定是寫日記或記筆記的習慣，才會記得那麼多，看起來完全錯了！

琦：各地方常會寄些漂亮的紀念本子來，我每次記事情在本子上，總是記個一、二天就沒有了。

廖：您的文章總是充滿儒家溫柔敦厚的情懷，這樣的情感流露，您覺得是受到教育的影響？還是天生的個性使然？

琦：我想是一半一半吧！我從小生長在農村，左鄰右舍的老先生都是出口成文的，如果背不好文章，他就會給你打手心。我父親給我請了一位家庭老師，

我要是不背書，他不但會打我手心，還會要我罰跪在菩薩面前，因為他是信佛的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每一次我被罰跪，我大媽就心疼得不得了，總合掌在邊上陪我。我說：「大媽妳別站了。」她說：「妳跪多久，我陪妳多久。」我只好跟老師求情。老師就說：「妳現在要懂得，一個人自己要怎樣成就自己、勉勵自己，長輩多愛妳。」

廖：所以，您覺得是教育的影響？

琦：對，老師就是用這樣的方式，使妳印象不得不深刻的。還有大伯，其實是離我們很遠的，二媽也是跟大伯住在北京的。我本來想如果大伯回來，我就不至於這樣常挨打了，沒想到這原來是大伯交代的。我哥哥去世得早，所以，我是大伯唯一的希望。如果再沒有把我教好，大伯會覺得對不起我的親生父母。不過，我想自己到現在還沒有學好，沒有什麼成就，還是很難過的。

廖：您真是太客氣了！在台灣的學生幾乎人人都讀過您的文章，都看過您的書的。

琦：我想是因為第一：我文字淺，第二：我都是講同樣的故事，所以，年輕的孩子喜歡。第三：在台灣也待過一段很長的時間，跟他們也經常有過交往。

廖：您記不記得總共出過多少本書？

琦：將近四十本吧！連翻譯算進去大概四十五、六本。翻譯的書，通常作者也是朋友。好比朋友的先生可能是外國人，或者太太是美國人，我很喜歡他們寫的英文作品，就幫他們英翻中，寄給台灣的出版社。這也是讓人家對我們華人更有好印象。

廖：那麼你持續寫作幾十年了，出版的書籍四十餘冊，我相信如果不是有很強烈的寫作動機，這是很難做到的。妳覺得寫作對妳來說，代表什麼樣的意義？會不會到後來變成一種習慣，不吐不快？

琦：這就是一種習慣了。人老了總是很囉唆嘛！免得跟先生囉唆，所以我就拿出筆來寫。寫完之後，我先生通常是我的第一個讀者，看過之後，往往會說：「不對，這裡跟你平常講的好像不一樣。」我說：「寫作你不懂的！」我們兩人又要吵架。不過，事後想想，我還是會接受他的意見。所以，我們夫妻

之間又衝突、又諧調，這也是老年的一種快樂。

廖：夏志清先生曾經為文盛讚您的文章，尤其是〈一對金手鐲〉這篇，認為題材和魯迅的〈故鄉〉相同，但沒有了魯迅文章的灰暗色調，拿來和李後主或李清照相較，不但不遜色，甚至境界還高些。另外他為您的〈髻〉抱不平，認為早該取代中學教科書裡朱自清的〈背影〉，成為學子必讀的文章。您自己對這兩篇文章的評價如何？可否談談寫它們時的心情。

琦：其實〈髻〉是在寫我二媽，我對她並沒有什麼抱怨，兩位長輩都各有梳頭的娘姨，她們之間的衝突就很多，在廚房裡就吵架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所以就把它寫下來。照說，童年心靈受到創傷的人，會變成恨心很重，幸而我大媽是信佛的，講慈悲。老說：「心中有佛，連恨都變成愛。」我對大伯也沒有抱怨，我哥哥去世，他也很難過，娶二姨太也是種種不得已。因為他們都很愛我，所以，我常扮演著居中協調的角色。

〈一對金手鐲〉我是寫一位和我同年的鄰居女孩，我和她情同手足。大媽曾把我手上的一對金手鐲分給她一只。只是，後來我到城裡讀書，她在鄉下嫁人了。我再回家鄉時，跟她有了距離，心裡很失落。那時，她已生了孩子。我們同床而臥，她拍著孩子睡覺，我覺得兩個人境遇改變上的不同，讓我很感慨，我就寫了這篇文章。夏志清先生是研究西洋文學的，我說：「我這個是土作品。」夏先生說：「土有土的好處。」你在大學裡常常接觸年輕人，一定比較了解他們的想法，以後，我應該向你多請教請教。

廖：您太客氣了。您的散文裡，對怨恨、憤怒這類的情感似乎是抱定原則不想多寫，固然有人稱讚您的溫柔敦厚，但是，也有人因此批評您的文章因為過度的溫柔敦厚，筆下常成是非不分的菩薩心腸。您對這樣的評論同意嗎？或者有不同的看法？是不是老一輩的文人比較重視社會教化的功能的緣故？您是不是認為文學思維的啟蒙事小，人生態度的導引事大？

琦：我接受，我也承認、也曉得老是寫好的一面，天底下哪那麼多好事情呢？可是我覺得，社會上壞事情已經很多了，所以為什麼不把好的一面表現出來

呢？有些朋友也會問我：「妳每次都寫好的，那妳自己不是也會生氣？妳生氣說話不見得都是很客氣、很文雅的啊！」我現在經驗多了、體會深了，我想如果我再寫，也會把壞的一面寫出來。不過我先生就講：「算了吧，妳這麼大年紀，還去寫壞事情。」所以，這恐怕是很難的，因為這筆已經成習慣了，寫好的寫慣的，一寫，心裡想到的都是溫馨的。

另外，我想也有可能是我的筆比較笨，反面或真正惡毒的事，我沒那個文采寫出來。因為婚後這十幾年來接觸的事情都很幸福，沒有遇到什麼壞人壞事，沒有那種深刻體認。所以，雖然覺得隱惡揚善比較好，不過也知道寫作一篇引起讀者興趣的小說，一面倒地全都是善的，人家也不一定接受。所以，我必須要訓練自己的筆，使善惡平衡，才能夠取信讀者。

廖：楊牧先生曾經將您的小品比喻成黑白及彩色的照片，說：「在黑白的和彩色網點之後，活動著一層引人思考的寓意和哲理。這層寓意和哲理隱隱約約，可有可無——有無之間，端視我們誦讀的靈視。」他的意思就是說，妳並沒有非常明白地寫出你所要表達的東西，可是讀者可以各自索取所需要的去解讀，有更寬廣的解讀空間。您覺得這樣的解讀是否深得您文章的要旨？

琦：真不敢當，不過他這樣的話可以鼓勵、增加我的信心。

廖：目前，文壇有許多顛覆性的創作，解構、後現代、魔幻寫實 等等，有些人甚至以寫出詰屈聱牙作品為高，文學陷入深奧難解的境界，以致引起許多讀者的抱怨、以為故示詭秘；可是，也有人認為有更多元的嘗試，也是多元社會的常態，是一種創意的呈現，將使文學更形繽紛多彩，值得鼓勵。您的看法為何？

琦：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，有些文章也不知道他在寫什麼，我會想是我退步了？跟時代連不上了？還是他故弄玄虛？如果是他故弄玄虛，我並不用去適應每一個作者，但是，我覺得有時候主編可能會想：「天天都登一些適合大家看的文章，為什麼不登一個怪一點的東西，引起別人注意。」所以我想這是窮則變，變則通。我想到早期就有一個很怪的文章，是王文興的〈家變〉，那

時轟動得不得了！在一次的電視座談裡，王文興曾經說：「應該看得懂的，看不懂是你自己的問題。」我就氣不過，寫了一篇關於讀〈家變〉的文章。但是，我後來想通了，他要這麼做，也是要以「變」來應「不變」，後來他又慢慢走回一個正常的寫作方式。所以我覺得「變」不要故弄玄虛，如果你是一種文學技巧，那也沒什麼不好，因為讀者有他的眼光，有他的適應性，慢慢他們能夠適應的。其實，要「怪」並不難，窮則變、變則通，變了以後要能通，變不通就走死巷子了。所以，我覺得文學是很難的，中國歷代以來也有許多作家是很怪的，就像韓愈的作品也是詰屈聱牙，這恐怕是很正常的。

不過，因為和一些作家和讀者都有聯繫，我也能夠體會到他們寫作的心情，總想爭取到主編能夠看他的文章。可是主編也很難，我聽過一位主編說，有時候開開心心登了文章，卻可能有資深的作家會說：「你登的這什麼文章，看都看不懂！」。所以主編也很困擾，究竟是要登一些很通順的文章，還是要包容每一種風格。

廖：有些海外的作家總擔心他們的作品沒辦法引起國內讀者的共鳴，而您離開台灣也有一段時日，卻仍然受到讀者的喜愛。針對這一點，您有什麼樣的建議呢？我看您仍舊看台灣的電視新聞，顯然對國內的發展很關心，您常和國內的人保持聯繫嗎？

琦：不敢當，事實上我是有點閉門造車，我總是維持我自己原來的風格。不過，我確實和國內的聯繫很多，我固定看聯合報，中國時報是寄人間副刊給我，還有中華副刊。所以，我一直和台灣沒脫節，這樣也可以讓我跟台灣精神有聯繫，腦子也不會變遲鈍。除此之外，各出版社也常轉來讀者書信。所以，我現在忙的就是回信，很重要。我覺得不回人家的信是很對不起的事，就等於你問他、他不回答妳一樣。就像從前給敬仰的老作家寫信，他不回信，我就很灰心了嘛！

我還記得以前在台灣教書時，一次，要去上課前，有讀者打電話找我，他說：「爸爸、媽媽罵我，老師也說我笨，我現在打電話給你，妳是我佩服

的人，你要不理我，我就去自殺。」這太可怕了！所以，我一下課就坐上計程車回家，馬上回電話給他，開導他：「不見得每個人都有時間給你回這個電話，不要這樣任性，父母、老師是為了愛你的...」。我覺得寫作的人有時要負起這種責任來。所以，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回信比寫作還重要，而且也沒有吃虧的，你在回信時，心裡常能產生靈感。

靈感不會一下子就有，所以筆要勤。我永遠感謝我大學裡的恩師 - 夏承燾先生，他曾經說：「一個人腦子要勤，要隨時想，不要沒有思想，像豬一樣就吃、睡是不行的。口要勤，要能跟別人交流、對談。」他說不要跟閉著嘴不說話的人交朋友，這種人保護自己太厲害了，不願意跟人家多談也不好。所以，寫作腦子要動、口要動、手要動。

廖：所以，寫作的人就是要對人有興趣、要有愛心、有好奇心？

琦：對，就是要跟人有交流。我每次有個念頭，就會跟我先生講，先生就說：「別囉唆！你寫你的吧！」我就說：「那我跟你就沒交流了！」有時候跟他說話，他一聲都不回答，我問他，他說：「不回答表示沒意見，說話就是要吵架。」作菜給他吃也是，他一聲不吭，我問他，他又說：「不作聲就表示還可以吃，說話就是批評，還是別講。」

廖：哈！男人多半是這樣的。您在海外是不是常常參加當地的文學活動呢？

琦：以前很多，這幾年比較少。剛開始來時，年紀比較輕，興致比較高，行動方便嘛！後來逐漸地我就儘量減少。現在，這邊年輕的一代常常會有新書發表會、讀書討論會會請我去，我說：「你先把書給我看一下，我有意見再給你書面，有時間就把我的意見唸一下，沒時間就算了。」有時候我會說乾脆來我們家聊聊天，大家可以席地而坐，也是一種聚會的方式。這樣，我先生也可以分享。

廖：您對於台灣的出版創作熟悉嗎？比如說你對哪些作者有比較深的印象嗎？

琦：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潘人木，她的作品有〈漣漪表妹〉，前一本是〈馬蘭的故事〉，我對〈馬蘭的故事〉印象最深刻的，我曾寫了一篇評論文章，而且

還特別回台灣參加中央日報舉行的一個潘人木作品座談會。其他的作品，大多是在報上看到。如果有什麼好作品，我就寫信給幫我出書的三家出版社，如果是他們出的書，就請給我寄來；如果是別的地方出的，就請幫我買一本來。所以，可以說我在這裡也是手不釋卷的。

廖：我們知道除了熟讀傳統文學之外，在中學之前，您也讀了些十九世紀英美小說，甚至一度還想到燕京大學讀外文系。可不可以為我們談談您的閱讀經驗？

琦：中學時，我的父親是絕對不許我讀新文學的，他認為所有的新文學都是無聊的小說，他不懂這也是文學，就是阻止我看。幸虧燕京大學那位教授，他是文學院院長，是我父親的好朋友。我就在他面前跪下來，說：「許伯伯，你得救救我！」於是，他就開導我爸爸，起碼讓我讀一些新文學的東西。但是，我從學校裡借來的每一本小說都必須經由他的許可才可以。不過，因為他不懂，又加上二姨太在旁邊興風作浪，可以讀的範圍很小。到了大學，受到恩師的薰陶，他鼓勵我接觸新文學。我想唸外文系，可是我父親不同意，他說：「你是中國人，應該唸中國人的東西，尤其夏教授也是讀中文的，而且又是中文系系主任。」可是，說實話，到現在我還後悔，為什麼當時不唸外文系呢！可是人是後悔不完的，只有現在多看看外文！只是，記性不行了，現在查完了就忘記。現在的上網，我也不會，我是「漏網之魚」！

廖：您從小被要求讀了很多中國的詩詞文章，而且要求背誦，這樣的閱讀經驗您覺得有效嗎？

琦：這倒是可以分兩方面來說。小時候背書可以說是：「和尚念經，有口無心。」都是瞎背；可是，現在我終於可以體會到為什麼古人用那幾個字、為什麼用那幾個調子，這才能體會到它的好處。但是壞處是甩不開了！古人都說過，我還再提做什麼？我再說一百字，還不如他說的那兩個字，所以少寫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舊東西讀多了，就會有些陳腐，所以我現在盡量少讀。就像亞弦說的：「你不會背的詩，就不要再去溫習它了，還是接受點新的。」我覺

得很對，新舊是要交融的，不要相互排斥，我就差這點。

廖：可不可以談談您現在的寫作，有沒有計劃？你一直以來寫作都是有計劃性的嗎？還是隨性的？

琦：從來沒有的，我有幾本靈感本子，有靈感時就記下來，但是多半都沒有成功。這也是我恩師說的：「靈感就像是雪花的一顆心」，為什麼呢，因為其實雪花在開始的時候也只是一個灰塵，在空中飛。灰塵本來是很髒的東西，但是有露水 霧水在上頭凝結，氣候一變，忽然它就變成一朵雪花了。他說那個「變」就是你的靈性，他說要有這個精神。凝不成雪花，就是連那一點灰塵都沒有了，對人生都沒興趣了，是不可以的。

廖：我從國內的報上看到一個有關您報導說，您將回大陸一趟？

琦：我是有這個念頭，但是，也要看我的健康情況。我預計九月中旬回我的出生地溫洲。我曾經從台灣寄錢回去，把老家的房子整理好。留出兩個房間作我的文學館，我在台灣出版的書都運過去了。地方上也主動捐錢，我和妹妹也出了些錢，在那兒辦了個三溪中學。大夥兒都很高興，希望我們回去看看。

廖：回去可能待很久嗎？

琦：不會太久，我是經過上海坐火車直接回去，我最喜歡坐火車。在溫洲大約停留半個月，再從溫洲到台灣，因為那裡很近，然後再從台灣回美國，加起來約一個多月。

廖：前幾天，採訪王鼎鈞先生，他說明年可能回到台灣去寫一些東西。你有沒有長期回台灣的打算？

琦：沒有，因為家現在是在這裡，還有主要是行動不便。這次回去，還得非常健康才行，怕頭暈又犯。

廖：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，祝您大陸之行一路順風。